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邓演达研究综述

翟亚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科研管理部,北京 100080)

摘要:国内学者在国内外邓演达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收集新资料、提出新见解、拓展新领域,在邓演达研究方面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从研究概况、既有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观点和新分析、一些新领域的开拓等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介绍,以反映邓演达研究的深化和进展情况。

关键词:邓演达;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平民革命;平民政权;民族主义;农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5)02-0212-06

一、研究概况

20 世纪 30～40 年代,国内学者开始收集整理邓演达资料并对邓演达的思想进行研究①。新中国成立后邓演达研究陆续推进,中间曾因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有过停顿,但伴随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这一研究重获生机。20 世纪 80～90 年代,国内大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②,这些成果对邓演达思想生平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包括新发现的邓演达家书和电文在内的各种史料,沿用文献收集研读和比较法等传统方法,继续探讨邓演达思想生平,取得丰硕成果③。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如 2000 年 9 月在邓演达家乡广东省惠州市举办"邓演达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以及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学者在会议上提交论文 46 篇;2001 年 11 月在广州举办"邓演达思想系统以及核心学术研讨会";2003 年 3 月在广州举办"广东邓演达家信研讨会"。此外,还在广州举办过几次年会,每次会议都征集到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些学术交流推动并丰富了对邓演达的研究。

二、既有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观点和新分析

20 世纪 80～90 年代,国内学术界热衷于研究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或平民政权)、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农民问题等方面的思想以及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继续研究这些领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或进行了一些新分析。

(一)关于邓演达思想体系及其平民革命理论体系

王夫玉将邓演达思想体系概括归纳为三部分:第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第二,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第三,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邓演达思想具体表现为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民族独立思想、军事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哲学思想等[1]。

曾成贵则专门考察流亡期间邓演达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尤其是探讨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体系和革命方略形成的大致时间,梳理了 1927 年 6 月至 1930 年 5 月邓演达在国外流亡期间进行理论思考的基本内容,认为这一时期邓演达全面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平民革命的理论体系和革命方略,为其回国后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平民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基本奠定了这个政党的思想格局[2]。

(二)关于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

20 世纪 80～90 年代,一些学者论及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时认为,邓演达关于民族问题的原则与孙中山所阐述的原则是一致的,亦即对外要求中华民族独立,对内要求各民族平等,邓演达还"提出了国际反帝国主义联盟的统一战线方

收稿日期:2014-12-08

作者简介:翟亚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国内外中共党史评析研究.

针”[3]6。

21 世纪国内学术界对邓演达的民族问题继续研究。刘强认为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属于典型的“外生刺激型”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其主要内容包括族裔型民族主义、集体化民族主义、承载民族主义的主体阶层和反对不平等的世界主义等四大内容。不同的民族主义往往会导向不同的制度建构。邓演达对民族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对理解后发展国家民族主义的特征和逻辑演进，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

陶季邑在分析了孙中山和邓演达民族团结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后指出，邓演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其民族团结思想存在一些不足，如孙中山在“五四”以后开始抛弃建设“五族共和”、“民国合五族而成”之类口号，而代之以“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等主张，但邓演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却仍然使用“五族共和”之类口号。不过邓演达在民族团结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5]。

（三）关于邓演达民权主义尤其是建立平民政权思想

邓演达在民权问题上通过剖析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指出了官民对立、人民与政权相隔离等封建官僚制度的突出矛盾，进而提出民权必须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强调民主的阶级性，主张将政权彻底归于平民。邓演达将民权的实现建立在国家权力和人民自觉的力量的基础上，努力克服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西方代议制弊病，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给后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6]。

邓演达在建立平民政权的政治纲领中提出以职业团体的代表组成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主张。这种职业代表制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涉及，但都是将其置于平民革命理论的叙述中，很少单独考察这一主张的形成过程，更没有探究其理论形态与思想内涵。孙宏云撰文对邓演达职业代表制的论述加以介绍，并重点分析其提出的政治背景和理论渊源，讨论了邓演达对职业代表制实现途径的思考，指出在实现职业代表制的构想途径上，邓演达一方面认为中国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强调“党”对于职业团体的组织与引导作用，主张通过“客观的阶级斗争”以造成平民政权进而实行职业代表制[7]。

（四）关于邓演达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

一些学者认为，邓演达的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具体而言，邓演达民生主义的宗旨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3]143。

21 世纪国内学术界对邓演达思想的研究涉及邓演达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等重要内容，如国家资本主义和对外开放等④。有学者专门分析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的苏联因素，发现在邓演达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中，“或多或少，或正或反，都有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子”[8]259。“邓演达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经验的肯定，某些失误的批评，某些创见的提出经受了几十年历史的考验，更反映了他高深的理论素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力，更令人佩服”[8]269。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既超越了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思想，又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思想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而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则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改造，引导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种形式，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一种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一种国有经济形态，以此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前程”[9]。

李琪珍提出邓演达的对外开放观包括：敏锐的政治开放观、务实的经济开放观和批评的文化开放观。在分析邓演达的经济开放观时指出，邓演达提出在国家有计划的调节与干预下，实行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剂作用。邓演达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政策”：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国家应设置租营制度”等[10]。

陶季邑从对外开放的原因和原则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来对比孙中山与邓演达对外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邓演达对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问题作了可贵的探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并颇具国际眼光。历史没有给邓演达提供实施对外开放思想的机遇，但邓演达的对外开放思想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因为它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反映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符合国人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愿望[11]。

(五)关于邓演达农民问题思想

21世纪学者们则进一步探讨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包括土地问题的主张⑤,并产生了一些新看法。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邓演达的土地主张明显处于激进与渐进的两难困境。究其原因既离不开他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也离不开当时激荡时局下邓演达的武汉国民政府要员和农民部长身份对他的制约,更离不开他浸染于其中的民生主义思想的影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诉求是"平均地权"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基本策略是"从政治上着手",通过和平的步骤,实现"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这两个方面规约着以后国民党,包括邓演达在土地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12]。

郭根山从四方面归纳了邓演达农民土地理论的思想渊源:①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民生史观中的合理成分;②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④太平天国土地纲领的影响。邓演达的农民土地分配方案中可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痕迹,其借鉴了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这个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研究领域尚属创新[13]。

(六)关于大革命后期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邓演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未能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其主要原因是:邓演达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观察问题的片面性以及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失误[14]。

朱新庸认为,大革命后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实是源于两者在革命纲领方面的差异。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在有关反帝反封建、推翻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实行土地革命、争取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等方面基本一致,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主张上却有着多方面的分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有关中国革命动力对象、革命政权的建设、土地革命纲领等问题上各自见解不同。而这些分歧的根源是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三个时期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而邓演达的纲领则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15]。

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之所以"有过亲密的合作,也有过分歧的波折",除了双方由于某些误解引起的分歧之外,更多的还是共产国际的强势干预和苛刻责难的压力所致。对邓演达这位坚定的"左派"领导人物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邓演达及其领导的"第三党"政策过"左"、策略失当;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的定性草率、评论武断,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处理与邓演达关系问题上所应当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16]。

李波从中国共产党政策演变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态度演变的原因,指出这一原因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准备不足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左"的政策的影响,也与邓演达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有关。邓演达及以他为首的"第三党"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的错误认识与主张,是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对其采取排斥态度的重要原因[17]。

(七)关于邓演达生平活动

叶洪添利用新发现的邓演达家书,对邓演达两次出国考察的思想发展轨迹加以描画:邓演达出国考察的主要原因是为救国救民,通晓"革命道理"和"革命方法";邓演达出国考察的主要内容和收获是革命思路更加清晰,思想境界得到升华,革命献身精神更加坚定,为《政治纲领》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18]。

黄振位也通过邓演达的家书分析邓演达在德国和俄国考察学习时的具体表现,认为邓演达当时在国外学习,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学习目的明确"、"富有学习恒心"、"革命意志坚定"、"始终胸怀祖国"和"树立献身精神"[19]。

大革命时期,广州的黄埔军校广为人知,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亦改称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却长期鲜为人知。袁继成的《邓演达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文专门考察了邓演达等对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建立和发展、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20]。

陶季邑从《广州民国日报》上发现了大革命时期邓演达的电文,包括1927年1月邓演达围绕蒋介石视察武汉而撰写的4份电文[21]和1926年8月至1927年3月邓演达分别致孙炳文等人或机构的9份电文[22]。他利用这些新发现的电文考证大革命时期邓演达的一些重要史实,如通过邓演达对蒋介石视察武汉而撰写的4份电文,发现学术界流行多年的那种邓演达在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视察武汉期间)就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从此开始了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不符合史实的,邓演达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应当是在1927年1月26日江西庐山

会谈期间。

三、一些新领域逐渐得到开拓

国内学术界在邓演达研究方面不仅考察一些既有领域，而且努力探讨一些以前研究得较少或根本无人问津的领域。通过对这些新的领域和新问题的探讨使得此时期对邓演达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内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勇于求索的可贵精神。

（一）关于邓演达民主思想

20 世纪学者们在研究邓演达民权思想尤其是建立平民政权思想时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邓演达民主思想这一问题，但并未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而且他们往往只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民主”这个概念。21 世纪一些学者则打破这种研究局面，亦即专门研究邓演达民主思想，有学者甚至从多层面来解读邓演达的“民主”。2014 年 2 月，《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就刊发 3 篇关于邓演达民主思想研究的论文。

第一篇系冯永宁的《邓演达的民主理想与实践》，该文赞扬邓演达一生追求崇高的民主理想，是践行民主的模范和捍卫民主的勇士，指出：邓演达在军队践行民主建军路线；在政权建设上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在民主建党上也开创了革命新途径[23]。

第二篇系叶洪添的《邓演达民主思想初探》，此文从四个方面就邓演达的民主思想进行探讨：一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先决条件；二是建立“平民政权”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三是建立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最后目的和理想；四是民主意识渗入社会生活诸领域，体现在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文化民主方面，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24]。值得一提的是，叶洪添在此文中从多层面来解读邓演达所谓的“民主”概念。

第三篇系黄振位的《邓演达民主政治思想的含蕴》，该文认为邓演达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社会历史时代的特征。他的这一思想，是其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民主政治是国民革命的使命；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众；民主政治是平民革命的重要内容。平民革命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就包括民主政治的内涵，而民主政治也是平民革命的重要诉求[25]。

（二）关于邓演达哲学与文化思想

邓演达所说的“实事求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思想里所说的“实事求是”，而仍沿用古义，即严谨好学、务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因为在哲学的最高问题——世界本原问题上，邓演达所表示出的是一种游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或超越于二者之上的二元论倾向。邓演达哲学思想中的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在较大程度上限制或妨碍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因此，那种根据邓演达使用过“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就得出他的“唯物史观已达到很高程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26]。

陶季邑深入分析邓演达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归纳邓演达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邓演达文化思想基本上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但他又指出，因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所以邓演达文化思想并不完全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但是其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而且在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27]。

邓演达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他在革命斗争中积极批判封建文化的封闭和专制，赋予传统文化积极因素和现代内容；深刻批判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否定“全盘西化”。邓演达文化思想的主旨就是推行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革命文化”，通过革命的途径，以人民民主的新文化取代封建文化，其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28]。

（三）关于邓演达军事或革命战争思想

邓演达的建军思想和治军理论包括：“建立一支来自农工的平民革命军队”，“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指挥”，“政治训练是军队的生命”，“厉行民主建军”，“运用哲学思想指导军事工作”。当然其建军思想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⑥。

刘育钢从四个方面归纳邓演达的建军思想。即：要革命就必须建立革命民众的武装以反抗和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指挥；政治训练是军队的生命，劳动训练当更为平民革命军所心习；厉行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认为其军事理论和思想是革命的、进步的，具有合理性和前瞻性，其基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军思想不谋而合[29]。

邓演达从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出发，结合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战争实践，对战争的起因、本质、作用、战争同经济的关系等，在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阐述和探索。邓演达明确指出战争是解决

社会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军事力量是政治力量的集中体现,而经济在战争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他还论述了组织平民革命军对进行革命战争的意义,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主革命战争的理论推到一个新高度[30]。

(四)关于邓演达国家统一与外交思想

陶季邑较早地从国家统一思想方面分别探讨了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原因、目标或构想、实现统一方案或途径的看法,指出孙中山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探索对邓演达探索中国统一问题产生了推动作用。邓演达在中国统一目标等一些具体设想上,与孙中山设想"民族统一"、"财政统一"、"军事统一"等思想基本上保持一致,但邓演达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孙中山的中国统一思想[31]。

陶季邑还对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邓演达外交思想进行研究。邓演达外交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大革命失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其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思想,顺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其中的主要主张与后来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外交主张基本一致,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民主主义外交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建设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32]。

此外,还有一些新论题亦引人注意。王业兴对此前几乎无人涉及的邓演达女权思想主张及其形成的原因加以考察。概括了邓演达的"女权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邓演达女权主张产生的原因与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女权思潮紧密相关,与20世纪初女权思想内容密切相连,与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联为一体,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33]。姚宏志将兴起于1936年秋的"新启蒙运动"这个概念的认定向前追溯6年,认为这一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体现在其1930年11月发表的《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中[34]。

四、结 语

国内学者们不断收集新资料,并充分挖掘既有的资料,经过潜心研读,在邓演达研究方面取得较丰富的成果,如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许多论文,还围绕邓演达思想生平的某些问题多次成功地举办学术研讨会。这些成果不仅继续考察一些既有领域,而且努力探讨一些新领域,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国内外学术界对邓演达的研究,也为日后国内外进一步研究邓演达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目前,国内邓演达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有关的资料不足,研究难以更全面而深入;一些成果在观点和内容上显得似乎有些重复,缺乏新意或新分析;有的论文证据或论述不大充足;在联系邓演达思想的现实意义时,有些成果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等等。但瑕不掩瑜,国内学术界毕竟对邓演达做了不少有益的或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学者们颇有学术价值的观点、不断探讨新领域的进取精神以及设法寻找新资料的各种努力;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多年以来一直在推动邓演达的研究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笔者认为今后应深化邓演达研究:国内学者宜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邓演达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挖掘工作,包括前往我国台湾地区和欧洲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德国)寻找有关邓演达的资料;在研究和评价邓演达时,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夸大也不贬低邓演达的历史作用;在研读有关邓演达的历史资料时,力图准确理解,不要误读;在挖掘邓演达思想的现实意义时,不宜牵强附会。

注释:

①章伯钧:《邓择生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华论坛社,1946年);邓演达先生殉难十五周年纪念会:《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

②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有: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丘挺:《邓演达年谱》(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叶洪添:《邓演达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梅日新,邓演超,丘挺:《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梅日新,邓演超:《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等。

③2000年以来,在中国知网以"邓演达"为关键词搜索,检索出相关主题论文250余篇。文集方面包括: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研究新论——纪念邓演达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七十周年》(华文出版社,2001年);黄振位,黄济福,梅日新:《邓演达研究与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等等。专著方面则有:马烈:《农工先驱——邓演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杨资元,冯永宁:《北伐骁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黄振位:《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樊振:《邓演达年谱会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韩斯疆:《中日邓演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高萍萍:《喋血沙子岗的农工先驱:邓演达》(南京出版社,2012年),等等。

④代表性的论文有周蕴蓉：《论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宋连胜，李波，王海胜：《论邓演达的社会主义观》(《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8 期)；陶季邑：《孙中山和邓演达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启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⑤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智媛：《邓演达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陈益元：《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建构及其思想基础》(《安徽史学》，2004 年，第 6 期)；王业兴：《孙中山与邓演达解决乡村问题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⑥参见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思想体系研究》(未公开发表)，2010 年。

参 考 文 献

[1] 王夫玉. 邓演达思想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47-52.

[2] 曾成贵. 流亡期间邓演达对中国革命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1(1)：87-92.

[3] 叶洪添. 邓演达研究[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 刘强. 邓演达民族主义思想评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4)：26-30.

[5] 陶季邑. 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启示[J]. 广东社会科学，2008(1)：100-105.

[6] 崔珏. 邓演达民权思想初探[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2)：40-42.

[7] 孙宏云. 平民政权与职业代表制——邓演达关于中国革命与政权的构想[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2)：75-85.

[8] 梅日新，邓演超. 邓演达研究新论[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9] 杨攀. 试论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37-441.

[10] 李琪珍. 探析邓演达对外开放观的核心内涵[J].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51-54.

[11] 陶季邑. 孙中山和邓演达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启示[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87-93.

[12] 陈益元. 在激进与渐进之间：邓演达在 1927 年革命转折时期的土地主张[J]，社会科学家，2003(6)：146-149.

[13] 郭根山. 论邓演达农民土地理论的思想渊源[J]，河南社会科学，2006(5)：128-130.

[14] 梅日新，邓演超，丘挺. 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304-312.

[15] 朱新庸.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与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的比较[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3)：60-65.

[16] 叶文益. 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73-179.

[17] 李波. 中共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态度的演变与中共统战政策的转变[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5)：8-10.

[18] 叶洪添. 寻求革命真理 为救国而献身——邓演达两次出国考察的思想研究[J].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57-61.

[19] 黄振位. 民主革命派的开拓者：邓演达[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48-54.

[20] 袁继成. 邓演达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88-92.

[21] 陶季邑. 新发现的邓演达四份电文及其学术价值[J]. 红广角，2000(12)：30-32.

[22] 陶季邑. 邓演达电文再次发现及其学术价值[J]. 红广角，2012(8)：47-49.

[23] 冯永宁. 邓演达的民主理想与实践[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82-84.

[24] 叶洪添. 邓演达民主思想初探[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85-88.

[25] 黄振位. 邓演达民主政治思想的含蕴[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78-81.

[26] 杨菲蓉. 也谈邓演达与“实事求是”——兼论邓演达哲学思想的局限性[J]. 求实，2003(3)：35-37.

[27] 陶季邑. 论邓演达的文化思想[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6)：18-23.

[28] 温朝霞. 邓演达的文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59-62.

[29] 刘育钢. 略论邓演达建军思想[J]. 甘肃社会科学，2003(1)：133-135.

[30] 李文平. 简论邓演达的革命战争思想[J]. 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6(3)：11-12.

[31] 陶季邑. 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探索及其启示[J]. 广东社会科学，2006(3)：105-110.

[32] 陶季邑. 邓演达外交思想探析[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4(3)：97-102.

[33] 王业兴. 邓演达女权思想探析[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430-434.

[34] 姚宏志. “新启蒙运动”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J]. 中共党史研究，2011(6)：120-123.

[责任编辑　周　莉]